



單人匹馬直心行—— 我的學思歷程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專長為英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

壹、前言

很高興又榮幸回到法鼓文理學院。記得上次來演講是去（2020）年12月，也是同樣這個場地。我今天早課讀到《聖嚴法師108自在語》中的一則：「隨時服務他人，終生幸福；有力不結善緣，後悔莫及。」因此，非常感謝辜琮瑜老師邀請我參加今天的「心靈環保講座」，讓我有機緣以經驗來服務諸位，以學識來廣結善緣，賦予我幸福，避免日後追悔。

這次主辦單位希望我來分享個人的學思歷程，因此這次的講題是「單人匹馬直心行——我的學思歷程」。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跟我的姓名與生命經驗息息相關：我姓「單」，生肖屬「馬」，經常閉門讀書寫作，獨處獨行，「直心」為「德」，「興」又與「行」諧音，也帶有「興起」的意思。而「學思歷程」裡既有「學」又有「思」，兩者並行，相輔相成，期望能夠不罔、不殆，也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學中做、做中學」，雖然關注結果，但也重視過程。

這個題目我從來沒有講過，因此今天想藉由個人學思歷程中的幾個不同角色，與諸位分享生命故事，看看在南投中寮鄉下出生長大的庄腳囡仔，如何在因緣的牽引下，逐步踏上文學與文化研究之路，並且在佛法中找到生命的依歸。進而將一己專研的文學志業與終極關懷的佛法修習結合，透過不同的方式與面向，一方面不斷學習，自我精進，另一方面期盼能盡綿薄之力，來推動人心之淨化，以及人間淨土之建設。

這次演講大綱分為八項，以「回首前塵」開始，「六者合一」結束，中間則以個人扮演的六個不同身分——譯者、學者、

訪者、作者、編者、行者——帶出人生中走過的道路。附錄的參考書目是遵照主辦單位的要求，列出我編、寫、譯、訪的部分書單，供諸位參考。

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在給弟子的一封信中寫道：「寫文總要有個『我』在裡面，是自己所經歷的親切可感的問題，無論或述或作皆須進到自己之生命，不可令人有隔之感也。」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愈發體認到這種方式的殊勝，希望自己的生命與述、作能愈來愈緊密結合，並且透過現身說法，沒有隔閡地傳達給有緣人，對他們有所助益。這與其說是「自戀」或「自我感覺良好」，不如說是力求將自己最深刻的人生經驗與感受，以真誠、平易、可親的方式傳達給別人。以今天的場合來說，就是希望藉由分享我個人的學思歷程與生命故事，來召喚諸位內心的生命願景，以期發揮最大的感染力。

今天既然來到法鼓山，就從我個人生命中印象深刻的一則故事開始。我是在 1988 年夏天退伍後的第二個週末到農禪寺皈依於聖嚴師父座下。第二年某個週末（查閱《聖嚴法師年譜》應是 3 月 11 日），我臨時起意，想到農禪寺聽師父開示。進到寺內，推開大殿的側門，卻發現裡面有許多人席地而坐，一個人手拿麥克風站在前方主持，聖嚴師父就端坐在佛像前的藤椅上。

當下我就像一匹誤闖叢林的小馬，而且是佛教叢林，本想悄悄掉頭離去，但有人招呼我留下，既來之則安之，於是就地坐下。原來眾人正在討論要如何興建法鼓山？如何勸募？現場氣氛熱烈，大家競相發言。只見一位師兄舉手，麥克風遞過來，他就以流利的臺語發言，大意是建立道場需要大筆資金，大家一定要努力，因此建議採用連鎖經營的模式，募款便會滾滾而來。他的立意良善，但所用的字眼卻不恰當，尤其是提到要模

仿「老鼠會」那樣發展時，令在場信眾十分錯愕。因此主持人當下斬釘截鐵地表示，絕不考慮用類似方式來募款，現場氣氛頓時非常尷尬。

當時大家同此心，都希望師父最好是聽不懂臺語，這件事就此帶過，再繼續討論。沒想到一直端坐不語的師父，這時吩咐把麥克風遞給他，大家都不清楚是什麼狀況。麥克風到手後，師父不疾不徐地說：「我剛剛有沒有聽錯啊？是不是有人提到什麼『老鼠會』啊？」這下子大家就更尷尬了。正當不知如何是好，師父接著說：「我們的勸募不只是為了募款，更是為了募心，是為了推廣佛法，用佛法跟人結緣，就像點燈一樣，一盞接一盞傳下去。這在佛法裡不叫『老鼠會』，而是稱作『無盡燈』。」

師父說完後，原先尷尬的氣氛立時就化解了，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打心底佩服師父的善巧方便。不僅主持人覺得緩和了自己先前的嚴詞拒絕，提議的師兄也很高興自己的建議與佛法相應。從這個小故事就可以看出，聖嚴師父以他的慈悲與智慧，幽默善巧地把原先不當的措詞與尷尬的氣氛，轉化成與佛法相應的說法，令在場人士皆大歡喜。因此，我很喜歡分享這個故事。

再分享一個故事，發生在那件事之後的兩、三年。當時農禪寺的初級禪訓班每星期聚會一次，每梯次四星期，而我住在南港，距離北投較遠，就沒參加。不過我明白佛法與一般知識不同，是需要實修的，尤其自己身處學術界，深切體認到學者腦袋裡的理論很多，嘴巴裡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往往與親身實踐有不少落差。因此在皈依後，我就一直期待實修的機會。

1992年元月，我在《人生雜誌》上看到一則社會菁英禪修營的消息，就馬上打電話到農禪寺，表示我很想參加禪修營，

但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社會菁英」？接電話的師姐（後來才知道是趙卯琳師姐）問我在哪裡服務？我說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副研究員。她就說：「算啊！算啊！」還好她沒說：「算了，算了」，否則這件事很可能就此算了。於是當年二月我就有機緣第一次參加法鼓山的禪修。

那次的社會菁英禪修營沒有所謂的「第一屆」，因為只是試辦性質，還不知道社會的接受度如何，能不能辦下去。結果很成功，於是有了第二屆、第三屆，後來改名為「自我超越禪修營」，轉眼就要滿三十年了。因此我常戲稱自己是「黃埔一期」。「有圖有真相」，當時全山唯一的建築就是後來拆除的觀音殿，殿裡的觀音就是現在高踞山頂的開山觀音。附圖是第一屆禪修營學員在觀音殿裡禪修的照片，對這些平日養尊處優的社會人士，稱這次的禪修營為「震撼教育」毫不為過。



1992年2月單德興（後中）參加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修營（果賢法師提供）

那三天聖嚴師父使出渾身解數，除了帶領禪修、打坐，還教導佛法大義，並一反慣例允許隨堂筆記，方便禪修學員把佛法「打包」帶回家，可時時參閱。菁英禪修營最後一天上午，聖嚴師父帶領我們踏查法鼓山。從那時起，我就認為師父是法鼓山的最佳導覽員。師父從不同面向為我們介紹法鼓山，包含他的理念、實踐方法，以及建設法鼓山的具體規劃等等。

師父帶著我們一路走一路講，不時用他的手杖指著，將來這邊要蓋大殿，那邊要蓋圖書館……，說著說著來到一處，師父說這裡的磁場特別強，將來要蓋禪堂。師父口中描繪著美好的遠景，但我們觸目所及卻只是一片荒煙蔓草。師父還說：「我心裡的法鼓山已經建好了，將來這個實體的法鼓山能不能建好，就是你們的事了。」

我剛剛參訪「大願·校史館」，竟然在「大願興學」的芳名錄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心裡感觸良多。非常佩服師父的悲心與願力，能感召這麼多人來共襄盛舉，才有今天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與法鼓文理學院。

剛剛提到師父在 1992 年對社會菁英禪修營學員所描繪的願景，當時說不定有人認為是癡人說夢。然而正如 19 世紀《湖濱散記》（*Walden*）的作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所說的：「如果你已經造了空中樓閣，你的努力未必白費；樓閣本來就該在空中。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底下打基礎。」（If you have built castles in the air, your work need not be lost; that is where they should be. Now put the foundations under them.）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功不唐捐」。為什麼？因為有了理想與目標，只要從基礎開始，一步步累積，終有一天會實現。常言道「有夢最美」，接著就要「築夢踏實」，讓理想能夠落實。

虛雲老和尚說：「空花佛事，時時要做；水月道場，處處

要建。」有夢想、願望很好，但也要努力落實，否則就淪為幻想、虛妄。然而，在落實的同時要看清它的本質是「因緣有，畢竟空」，在「因緣有」的情況下盡心盡力，時時處處廣度有緣，同時了悟「畢竟空」，不執著，無罣礙。就法鼓山而言，聖嚴師父一再強調「境教」，也就是環境教育，讓人來到這個環境不知不覺就受到感染，潛移默化，心境隨之清淨，一念清淨就是一念淨土。這個觀念來自《維摩詰經》中的「心淨則國土淨」，也是「人間淨土」的重要根據。

《維摩詰經》中又說：「直心是道場。」因此今天的「心靈環保講座」，「我的學思歷程」主標題「單人匹馬直心行」，就是要看看屬馬的單德興，個人如何以坦直的心，走出什麼樣的路，並且分享沿途的風光。

貳、回首前塵

一、踏上文學之路

我的父母親都是山東流亡學生，而且是其中罕見的夫妻檔。1948年10月他們一路從徐州跟著學校南下，隨順因緣流轉來到廣州，好不容易在1949年7月搭上115號登陸艇，離開烽火連天的中國大陸，渡海來到澎湖馬公，抵達那天正是7月7日抗戰爆發紀念日。萬萬沒料想到，7月13日，五千多名男生在刺刀脅迫下棄筆從戎，甚至有兩位學生當場濺血，是為「澎湖713事件」。母親則就讀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簡易師範科，兩年後畢業，分發到高雄縣鳳林國民學校任教，三年期滿請調到南投縣中寮國民學校。父親捱過漫長的十年軍旅生涯，終能退伍復學，就讀員林實驗中學師範部三年級，一年後畢業

於特別師範科，取得國校教師資格，依志願分發到南投縣中寮鄉，夫妻兩人終能開始新生活，重建家園。

我就出生於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鄉親寮，念了六年的中寮國民學校。父母親是知識青年出身，很重視子女的教育，尤其是母親的言教身教，影響我一輩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愛的教育，從未打罵子女，凡事講道理，常掛在口中的一句話就是：「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她也教導我凡事謙讓，常說：「爭則不足，讓則有餘」。因此，我雖然負責過一些學術行政和專業服務的工作，但都不是自己刻意爭取來的。然而有必須承擔的職務，我也不會推諉。任事的過程中雖然辛勞，但也增長了不少經驗，瞭解了更多人性，有助於我研究文學、學習佛法。

我外祖父很喜歡看書，重視孩子的教育，這也影響到我母親。當時中寮鄉沒有書店，她去南投鎮辦事時，常常到書店買一些簡易版世界文學名著回來，所以我和兩個妹妹從小就培養出閱讀的習慣。小時候住在學校的日式宿舍，母親下班回來，經常發現家裡靜悄悄的，但玄關上三個小孩的鞋子都在，上去一看，原來我和妹妹們在榻榻米上各看各的書，讓她覺得很欣慰。

那時還沒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1968年開始實施），因此我六年級時在學校參加惡補（惡性補習），考上省立南投中學初中部，分發到最好的唯一一班男女合班。三年下來雖然在校成績不錯，得以直升高中部，但是去到臺中立達補習班參加考前一個月的特別班，才發覺自己沒有參加臺中聯考的實力。那是我此生所遇到的第一個重大挫折，然而也因為這個挫折，讓我痛定思痛，知道不能以學校的平時成績自滿，必須有長遠的規劃與堅強的實力。因此，高中三年我全力拚聯考要考的六

個科目，幾乎不看任何課外書，眼中只有聯考，真可說是目光如豆。

當時大專聯考的錄取率大約是四分之一，在考前就必須先填寫志願。我因為英文成績比較好，而且從小就希望能像父母一樣當老師，所以就與母親仔細商量，第一志願填師大英語系，第二志願填臺大外文系，第三志願填政大西語系，填完所有公私立大專院校的英文系和外文系之後，再回過頭來填公立學校的其他學系，完全不曉得在私立學校之後再填的這些志願根本就是白填。由此可見，我父母親完全尊重子女的興趣與能力，不迷信名校。雖然我並未如願考取第一志願，成為師大的公費生，但也幸運地上了第三志願政大西語系（全名為「西洋語文學系」，相對於該校的「東方語文學系」）。

進入政大西語系後，遇到我最重要的啟蒙老師，就是系主任余光中老師，成為改變我一生的關鍵。一般人對西語系的印象就是英文好，所以三不五時會有人拿些東西要你幫忙翻譯。既然擺脫不了這個宿命，就不如主動迎接，藉此精進英文能力。翻譯是西語系的必修課，開在四年級，但是我從大一就開始自修，從剛出版的思果先生的《翻譯研究》（大地出版社，1972）獲益最多，大學期間反覆細讀了七遍。直到今天，我依然大力推薦這本書作為精進翻譯與中文能力的基礎書籍。

眾人皆知余老師是名詩人，但很少人知道他的行政能力高超，在任期間有心提升政大學生的英文能力與文學風氣，其中之一便是以一系的經費舉辦全校中英翻譯比賽。為了培養自己的翻譯能力，我在大二時第一次報名比賽，賽前仔細閱讀《翻譯研究》，瞭解一些翻譯的理論與實務，出乎意料地得到首獎，這對來自鄉下、缺乏信心的我無疑是很大的鼓勵。大三時我再度參加，並不是不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而是我的目標更

明確、更長遠，就是要「以戰練兵」，藉由參加比賽精進自己的中英翻譯能力，重視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很幸運地，我蟬連首獎。到了大四，我又參加比賽，這次得到第五名，我坦然面對，因為我對自己的目標瞭然於心，知道自己在過程中的付出與收穫，不會因為最終的名次高下而受影響。

我們這一代的中文能力大都來自教科書，程度相當有限，不像父母親那一代從小就耳濡目染，程度高強。因此，如果今天我的英文能力還算差強人意，中文寫作還算平白通順，很大原因就是當初從翻譯中字斟酌、慢慢琢磨出來的。我個人一直認為，翻譯是練習雙語能力最踏實的方法，因為其中涉及閱讀、理解、詮釋、表達。

除了參加翻譯比賽之外，我大二時修了余老師所開的英國文學史必修課，在老師帶領下閱讀早期英國文學。他在課堂上不時提起英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比較，以及現當代臺灣文學與文人軼事，都大大拓展了我們的視野，提升了我們對文學的興趣。在這種薰陶之下，幼時父母親為我埋下的文學種子逐漸復甦。以往我對這段師生之緣視為當然，不願多提，免得別人以為我在攀附名人。但隨著年事增長，投入文學與翻譯研究愈深，愈發感受到老師對學生的深遠影響，因此我後來就不憚於公開說余老師是我文學與翻譯的啟蒙師，表達感恩之意，不再擔心別人認為我在攀龍附鳳，因為事實如此，沒什麼好避諱的。

由於大二時的課程啟發了我對文學的興趣，於是我在大三時決定報考外文研究所，以英美文學研究為目標。大四時面臨研究所與預官的考試，許多同學選擇兩者兼顧。但我在同學那裡看到預官考試的模擬考題，瞄了幾題選擇題與答案，內容之八股令人難以忍受，當下決定放棄預官考試（寧願去當大專兵），專心一意準備考研究所。

那時臺灣有五家外文研究所，入學考的科目基本上是五科，其中「國文」、「英文」為共同科目，「英文作文」與「中英翻譯」講究的是語文實力，真正能準備的只有「英美文學史」一科。於是我大三那年重聽大二的英國文學史，大四蹺課蹺得很凶，但都是到圖書館準備研究所考試，從早上八點開館到晚上十點閉館。然而，我的作息也不是一成不變，在緊張中還是有所調劑：星期一到星期五讀文學史，星期六、日讀我所謂的「武學史」——金庸的武俠小說。當時金庸作品在臺灣仍是禁書，開數很小，冊數很多，印刷粗糙，作者名字改為「司馬翎」，書名也改頭換面，如《射鵰英雄傳》改為《大漠英雄傳》，避免毛澤東詩詞中「彎弓射大鵬」的聯想。我就這樣讀了不少金庸的武俠小說，成為準備考研究所期間最好的調劑。

那年臺大與師大的研究所考試日期衝突，於是我報考四家——臺大、淡江、輔大、文化——考了前三家，全都上榜。臺大外文研究所大概有一百二十人報考，錄取十二人，我以第五名考上。我在淡江甚至考了榜首，接到學校來信表示來註冊就會頒發五千元獎金，這在當時可是不小的金額，不過我選擇了臺大外文研究所，開始了文學研究的學徒階段。

二、走進學術之門

臺大外文系是臺灣外文學門的龍頭老大，兵多將廣，引領風騷，進入外文研究所不僅讓我眼界大開，也正式開啓我的學術訓練。我在臺大外文研究所待了整整十年——四年攻讀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六年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這段期間有三個比較特殊的經驗與各位分享。

第一個是「慢讀經驗」，這是從王文興老師那兒得來的。

王老師是位獨特的文學讀者與作者：在閱讀方面主張慢讀，理想的速度是一小時不超過一千字，一天不超過兩小時；在創作方面態度嚴謹，速度極慢，一天頂多寫三、五十個字。他在課堂上帶領我們細讀英美經典小說，並不時提問，讓同學作答，我戲稱有如「猜謎大會」。

王老師要求我們細讀、慢讀，不只是看文字表面的意思，更要深入體會作者的用意何在？技巧何在？他主張讀者要能看出字與字之間的關係，句與句之間的關係，以及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這是身為文學創作者的王老師對閱讀的特殊要求，也提供他個人的精采解讀，增進我們對文字的敏感以及對文本的領會。

第二個是「顛峰經驗」，這是從朱炎老師那兒體會到的。朱老師不是口才便給型的學者，情急時甚至有點結巴，但是他教書時全身所散發出的那種真誠，讓學生充分感受到他對文學的熱情與投入。有一次他請全班學生到他家，除了吃水餃之外，還讓我們看他的藏書和筆記。朱老師以研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聞名，在國內著名學術期刊發表多篇中、英文論文，學生們總覺得仰之彌高，難以企及。但是當我們翻閱他的筆記本，看到他平日讀書、做筆記、打草稿、修改的過程與種種痕跡，才知道「萬丈高樓平地起」，不是打個筋斗就上了山巔，而是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爬上高峰的。

記得從朱老師家回來的那個星期，我處於一種非常喜悅亢奮的狀態，凡是遇到的朋友都能明顯感受到。一直到多年後我讀密勒日巴和弟子岡波巴的故事，才發覺有類似之處。當岡波巴要離開師門時，密勒日巴知道師徒兩人將不再見面，於是目送弟子離開。即使岡波巴已經渡過小溪，師父還是把他從遠處

喚回，說：「我有一個殊勝的秘密法教要傳給你。」說著便裸露上身，讓弟子看到他長滿老繭的背。原來那是當年密勒日巴的上師瑪爾巴為了消弟子的業障，命他背石頭到山頂蓋房子，在不同方位的山頂蓋了又拆、拆了又蓋，辛苦勞動所留下來的老繭。師父的身教或不言之教，令弟子極為感動與鼓舞，朱老師之於我亦復如此。

第三個是「基礎訓練經驗」，這是從外籍教授李達三（John J. Deeney）老師那兒學來的。李老師在碩士班第一學期給予我們非常嚴格的基礎訓練，要求我們凡事都要根據美國現代語文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論文寫作規範，引用一句話、甚至一個觀念都要註明，否則就是抄襲（plagiarism）。他曾講過兩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多年難忘。首先，他曉得亞洲學生沉默寡言，不太發問，所以在第一堂課就叮囑我們：“The only foolish question is the question unasked.”（「唯一愚蠢的問題就是沒問出口的問題」），以此鼓勵學生多多發問。而在最後一堂課，他引用埃及學者曼札拉歐尼（Mahmond Manzalaoni）的話勉勵我們：“You can’t act as bridge and not expect to be trampled rather heavily.”（「要當一座橋，就必遭重踏。」）這句話對於外文研究者，介於中西文化之間的我們更是如此。因此，我從事翻譯，引介英美文學，傳播新知，固然辛苦，但不僅無怨無悔，還甘之如飴，因為這既是身為橋樑的命運和特色，也是難得的機會和榮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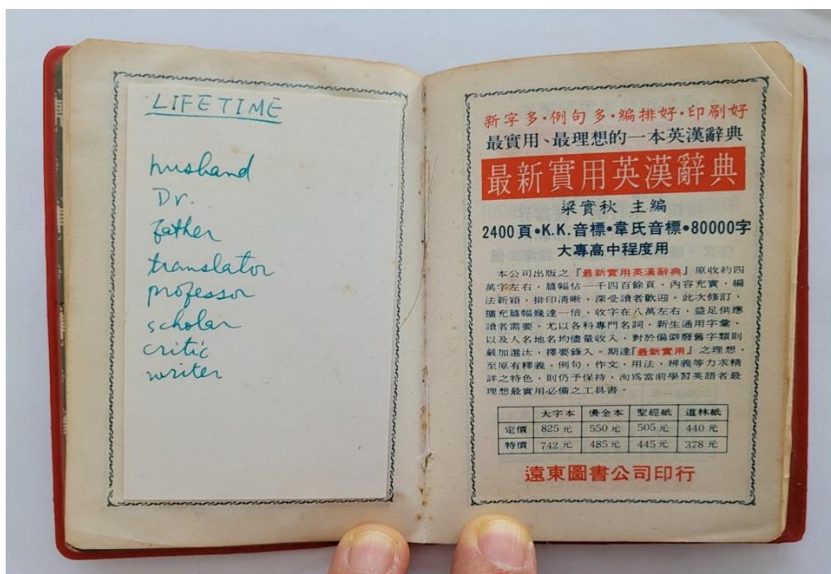
考量到家裡的經濟情況，為了不造成父母的負擔，我完全沒有出國深造的念頭，而是選擇進入臺大比較文學博士班，這是當時臺灣唯一的外文研究所博士班。我在兩年內修完學分，期間本來有機會申請進入國立大學任教，但陰錯陽差，失之交臂，整整一年心情非常低落，沒想到反而因此在次年申請進入

了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1991 年易名為「歐美研究所」）。其實我那時還不清楚中研院是什麼樣的機構，但現在回過頭來看，卻是最好的選擇，不然我不會寫出那麼多文章、出版那麼多書。這個經驗以及初中畢業時的受挫，讓我深切感受到禍福相依的道理，類似英文裡的“blessing in disguise”。

我取得博士學位才去當兵，那時已經三十一歲，因為有碩博士學位而服預官役，於 1986 年 10 月前往高雄鳳山陸軍步兵學校接受步兵排長訓練四個半月，那是所有預官役中比較艱苦的兵科。我在軍隊裡的日子與原先的生活落差非常大，一來因為年紀大，比同一中隊的五專畢業生年長整整十歲，甚至比中隊長的年紀都大；二來原本置身於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研院，突然來到南臺灣步校接受入伍生訓練，每天跑五千公尺，端著 M16 步槍攻山頭，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自幼稚園到博士班求學一路順遂，然而軍中那一年十個月真正讓我體驗到佛法所說的「八苦」中的六苦：老、病、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蘊熾盛。那段期間除了軍中的磨練（包括在跳箱時腳踝受傷），家庭方面則是遠離妻子，母親生病，而我在步校結訓分發後，每兩星期才能休假返家一次，心情非常苦悶，覺得自己多年所學卻在生命困頓時完全派不上用場。不過，也正是在這種身心遭遇嚴峻挑戰的情境下，讀了很多佛書。在我排長寢室滿滿兩書架的佛書中，個人覺得最圓融無礙、言之有理、具說服力的，就屬聖嚴法師的著作，因此我決定退伍後一定要跟隨這位法師修習佛法。於是在退伍的第二個週末來到農禪寺，在聖嚴師父座下皈依三寶，正式成為佛弟子。回頭來看，服兵役這件事也是 blessing in disguise。否則一生順遂，對生命之苦不會感受那麼真切，也就不能體會修行的必要與佛法的利益。

我一向喜歡看勵志、管理和實用技巧方面的書。幾天前整理研究室，赫然發現我博士班二年級（1982年）時的一本「公務手冊」，上面貼了幾頁我手寫的短程、中程與長程目標，這是讀了時間管理大師拉金（Alan Lakein）的 *How to Get Control of Your Time and Your Life*（《如何掌握自己的時間與人生》）之後所擬的。那本書於1973年出版，至今半世紀，銷售量超過三百萬冊，也有中譯本。我喜歡看這類書，因為其中只要有一個觀念或技巧適合自己，確實奉行，就會受益，重點在於能不能持之以恆。



單德興於1982年所擬的終身目標

拉金建議讀者擬定短程（六個月）、中程（三年）與長程（終身）的目標。於是我根據自身情況悉心規劃，寫在小紙片上，貼在隨身攜帶的記事本裡。這張圖片是當時快三十歲的我

對自己的終身規劃，列出了八項未來的角色：成家，取得博士學位，生養小孩，成為譯者、教授、學者、評論者、作者。擬定這些目標時像是在做春秋大夢，但就如同剛剛所說的「有夢最美」，更要「築夢踏實」，四十年後的今天來看，都一一實現了。

回顧起來，我這個山東流亡學生之子，在南投鄉下長大，接受小學與中學教育，再到臺北念大學與研究所，一路所接受的教育與學位都在臺灣，所以我常稱自己是 MiT, Made in Taiwan（臺灣製造），並引以為榮。

這次的講題「學思歷程」聽起來比較抽象，底下就以個人多年來的六個不同身分，結合具體的經驗以及實際的例子，從初衷、態度、方法等面向，與各位分享我到目前為止的歷程。

參、譯者之路

我的出版生涯要從 1977 年算起，到目前（2021 年）出版的譯作、論著、訪談、編輯、寫作算算有五十五本，數量大約只有聖嚴師父的一半，影響力更是遠遠不及。在這些出版品中，最早的就是翻譯，因此我從不諱言自己是從翻譯起家，並以此自豪。

在譯者之路上，我翻譯的類別集中在文學、文化和宗教（佛教）。其中與佛教相關的就是聖嚴師父的著作，從英文翻譯成中文，總共五本。《心的詩偈——信心銘講錄》（1997）譯成中文後，有人根據師父當時的禪堂開示錄音帶增補，因此我並未掛名，全書經師父過目，收入《法鼓全集》。其他四本是《禪的智慧：與聖嚴法師心靈對話》（2003）、《禪無所求：聖嚴

法師的〈心銘〉十二講》（2006）、《無法之法：聖嚴法師默照禪法旨要》（2009）、《虛空粉碎：聖嚴法師話頭禪法旨要》（2011），其中《禪的智慧》與《禪無所求》都由師父作序，除了說明譯作的出版因緣，也有些鼓勵我的話。師父基於對譯者的尊重，這些譯作都未收入《法鼓全集》。《無法之法》與《虛空粉碎》出版於師父圓寂之後，我特地撰寫譯後記說明翻譯與出版的因緣。

對我而言，翻譯的初衷是為了分享，就像一則風行的廣告詞所說的：「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也就是說，我身為懂英文的人，看到了好的英文作品，想要和有緣的中文讀者分享。雖然說很多時候根本不曉得有緣人在哪裡，但是後來在不同場合，不時有人會跟我說看過我翻譯的哪本作品，甚至說受到影響，讓我覺得很欣慰，功不唐捐。

既然初衷在於分享，翻譯時就要慎重其事，態度上要敬重文字，細讀原文，深入瞭解作者的用意，避免誤讀誤解，更勿錯誤傳達。換言之，處理譯文時要如實表達作者的意思，文字要流利通暢，不要淪為被人詬病的翻譯體（translationese），而這正是余光中老師與思果先生再三告誡的。

至於翻譯的方法，我這裡講的不是「翻譯研究方法論」的方法，而是實作時的方法，簡單來說就是「耐煩」：在閱讀原文時耐得住深入理解原意，在譯文表達時耐得住推敲琢磨，尤其要耐得住一改再改。或許因為我出身於翻譯比賽，所以格外留意譯文的忠實與流暢，早期多次在稿紙上修改、重謄，有了電腦之後更方便，一篇譯文從初譯到最後出版，改個十遍八遍是司空見慣的事。

今天在法鼓文理學院，就分享一個特殊的例子。我翻譯聖嚴師父著作的經驗，迥異於翻譯其他作者的著作。一般的翻譯，

即使像綏夫特（Jonathan Swift）這樣十七、八世紀的英國作家，我透過文字仔細理解與表達，再查證一些資料，基本上就可以了。然而翻譯師父的作品既有相似之處，也有殊異之處。

我跟隨師父打過幾次禪七，包括紐約東初禪寺的禪七，得以親身體驗師父的禪風，面對中外弟子時的指導，以及現場口譯的過程。因此在翻譯師父的作品時，除了一般的文本閱讀與理解之外，還有親臨現場的感受與體會，深知要用文字來傳達禪師在禪堂裡的風采與風範，是不可能的任務。換句話說，一方面我覺得自己有幸得以親近原作者，曉得他的禪堂風格與用語；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如此，更覺得文字無論如何精確，都無法取代或再現當下情境的親身體驗。這種弔詭就是經驗與文字之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或者翻譯研究中所稱的「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也就是意在言外、難以言詮。

從翻譯研究的角度來說，我翻譯的師父作品都來自禪七現場開示，內容主要是師父針對現場禪眾的需求，以白話文解說禪宗祖師大德的文言文著作，這在翻譯研究裡有個專門術語，叫「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也就是同一語言之內的翻譯。我在東初禪寺參加的那次禪七，擔任現場口譯的是王明怡居士，他的記憶力驚人，反應靈敏，用字精準，在在令人佩服，因此我等於是先聽了一遍中文開示，又聽了一遍英文開示，這就是一般人所認知的不同語文之間的翻譯，也就是「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師父這些開示出版的標準作業程序就是，根據英文口譯錄音帶謄打出文稿，經過編輯，刊載於東初禪寺的《禪雜誌》（*Chan Magazine*），集結出書前再經由出版社編輯作業，過程相當嚴謹。我的中譯稿則是先在《人生》雜誌按月連載，再由法鼓文

化出版，先後經過雜誌編輯與叢書編輯的雙重把關，以確保品質。我依照這個流程翻譯、出版過師父四本作品，是中譯師父作品最多的人。因此，一些佛教讀者印象中的我就是「聖嚴師父的中譯者」。

身為譯者，我對翻譯過程與最後成品總覺得有些事情必須交代清楚，這不僅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作者與作品負責。因此，我會加上序言或譯後記作為附文本（paratext），說明出書的因緣與該書的特色。在此，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特殊的經驗。我在校閱《心的詩偈》書稿時，心境異常平和、安詳，那種心安與我對自己其他譯作的感受大不相同。翻譯其他作品的心安，是自己在文字、能力、知識、時間、體力、精神上都已竭盡所能之後的泰然平和。而校閱《心的詩偈》時的心安，則是另一種內心的寧靜、祥和與喜悅，也是此生獨一無二的體驗。

《無法之法》與《虛空粉碎》的譯稿是在師父圓寂之後完成的。特殊的是，當年師父開示時，常悟法師就在現場，因此出版社委請常悟法師校訂。這當中遭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狀況：師父在禪堂開示時用的是同一個中文字，但口譯時為了順應上下文而用了不同的英文字。這幾個字經由常悟法師指出，我改回同一個中文字，並在後記中特別說明，表示這才是忠於師父原先的開示，以免有讀者對照原文，以為是我誤譯。

做任何事情最好都要有典範（role model）。我在翻譯方面的典範就是玄奘大師。我擔任行政職務時，曾把他的畫像掛在所長辦公室電腦前方的牆上，現在則置於早課位置的前方。每每在早課誦念《心經》時，遙想一千三、四百年前唐朝翻譯大師，譯作至今依然為人傳誦，心中就充滿無限的感恩與讚歎。有如此崇高的典範在前，效法都來不及了，又怎麼可能會傲慢呢？



玄奘三藏法師（602-664）樹立崇高典範

至於當代的翻譯典範，就是我的啟蒙師余光中老師。這裡分享兩張照片，一張是我大三時與余光中老師的合照，他那時從香港回臺灣，參加民歌演唱會，特地到政大與我們那班學生見面，在四維堂前拍照。另一張是四十二年後，余老師因為頭傷，無法參與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翻譯獎的評審（他是三位命題委員之一，其他兩位是香港的金聖華教授與臺灣的彭鏡禧教授），由我代勞，並在該文學獎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專題講座」中發表演講。其他兩位命題委員都針對題目與譯文進行分析與講評，我則另闢蹊徑，以「六譯並進的余光中」為題，向得獎者以及對翻譯有興趣的現場聽眾，介紹翻譯家余光中的方方面面，希望他們除了瞭解翻譯的技術面之外，更能以余老師為典範，將翻譯當成終身志業。我大學時在文學與翻譯方面深受余老師啟發，從此奠定了我的人生之路，當時絕對想不到



單德興與余光中老師於政大合影（1975年6月）



單德興於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講座（2017年4月6日，何杏楓攝）

自己竟然有機會能以這種方式來服弟子之勞，可見師生緣的深厚與不可思議。

肆、學者之思

我的學者生涯開始於 1983 年，那年 7 月我進入中央研究院，擔任美國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我的學術研究從美國經典文學開始，擴及美國文學史，再延伸到亞裔／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由於對翻譯的關注，因此也進行翻譯研究，並參與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力求兼顧翻譯的理論與實踐。身為臺灣外文學界的一分子，我很關切外來思想與臺灣在地文化相遇、落地生根後的發展與轉化，因此研究關懷也拓展到臺灣的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建制史。為了取得第一手的英美文學、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的資料，多年來我做了許多訪談，並根據這些訪談經驗對此文類進行反思，寫出《訪談的技藝》（國立

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0），上次應邀來貴校就是針對這個主題發表演講。

對學術界而言，我做的許多事情，包括翻譯與訪談，可說是不務正業，這些成見多年來難以改正，因此我在中研院申請升等為研究員時，參考著作沒納入翻譯作品。其實，身為學界的一分子，我對個人的所作所為自有評價，那些所謂的「外務」，其讀者群與影響力可能不下於所謂的「正業」（學術著作），甚至更為廣闊長遠。因此，樹立自己的學術觀與價值觀至為重要，不要受限於盛行的學術規範，但也不能完全視若無睹，而必須瞭解其運作方式與限制，努力拓展視野與範疇。

論 著

- 單德興（2000）。《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
- 單德興（2001）。《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台北：書林。
- 單德興（2006）。《「開疆」與「闢土」——美國華裔文學與文化：作家訪談錄與研究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單德興（2006）。《重建美國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單德興（2007）。《翻譯與脈絡》。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單德興（2008）。《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台北：允晨文化。
- 單德興（2009）。《故事與新生：華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單德興（2009）。《翻譯與脈絡》。繁體字增訂版。台北：書林。
- 單德興（2011）。《薩依德在台灣》。台北：允晨文化。
- 單德興（2013）。《論薩義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此書係《薩依德在台灣》簡體字修訂版）
- 單德興（2016）。《翻譯與評介》。台北：書林。
- 單德興（2019）。《跨界思維與在地實踐：亞美文學研究的多重視角》。台北：書林。
- 單德興（2019）。《翻譯家余光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單德興（2020）。《訪談的技藝》。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談到研究的初衷，就是探尋與解惑。我常常對一些議題感到好奇，想要進一步尋思與探索，解除心中的疑惑，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研究的態度，其實就跟修行一樣：不虛妄，步步踏實，

言必有據。此外，要尋求自己的定位，盡量瞭解既有的學術成果以及個人的發言位置，一方面要「繼往」，認知與承接前人的成就，但不受其限，墨守成規；另一方面要「開來」，在前人的基礎、甚至欠缺上，開拓、創新，更上層樓，努力發揮，開啟後來者的胸襟與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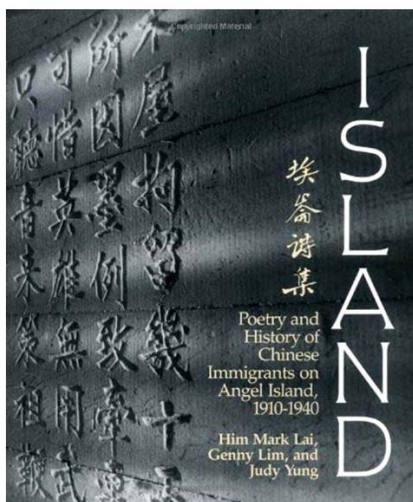
臺灣的外文學門研究要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很不容易。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在地的特色更為重要，具體來說，就是要善用自己的利基，掌握主觀的條件與客觀的因素，凸顯自己的長處。臺灣是多元文化薈萃之地，既有中華文化的傳承，也受到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影響，重要的是如何融合這些不同來源的文化元素，轉化為自己的特色，變成我們的長項，而不是排斥與阻絕那些根源與養分。正如余光中老師所說的，文化是加法，而不是減法。因此，要認清自己的條件與需求，多方接觸與學習，融會貫通，建立特色，塑造文化的特殊性與主體性。

我個人在研究方面的實例就是《埃崙詩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San Francisco: HOC DOI, 1980]）。天使島（Angel Island）位於舊金山外海，美國因為排華政策，自 1910 年至 1940 年，所有來自中國的移民都先安置在島上，確定身分後才允許入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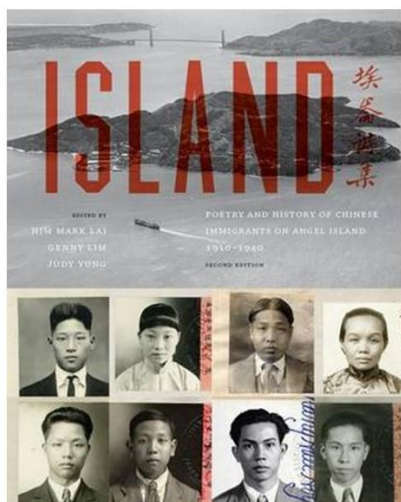
這些移民中有很多人冒用假文件，在天使島拘留多日，前途未卜，心情鬱悶，就仿照中國古代文人在牆上題詩，其中一些中文詩句並以刀刻在板壁上。1960、1970 年代美國族裔意識高漲，亞裔／華裔美國人重視自己的歷史傳承，天使島過客の後裔麥禮謙（Him Mark Lai）、林小琴（Genny Lim）、譚碧芳（Judy Yung）三位把辛苦蒐集到的板壁刻詩譯成英文，註解，加上導論、照片、訪談與參考資料等，於 1980 年出版，因為兼具歷史與文學價值，普受重視，榮獲 1982 年美國書獎（American

Book Award），1991 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重印，之後大幅增訂、改寫，於 2014 年出版第二版。三位編者中，我曾訪談過麥禮謙與譚碧芳兩位。

三人在 1970 年代進行訪談時，昔日歷經苦難的移民心中仍有顧忌，有些人擔心真實身分曝光會遭到遣返，所以初版時受訪者都隱去姓名。二、三十年後，美國社會更為開放，先前的顧忌已不復存在，而這些移民的子孫後代都以冒險犯難的祖先為榮，因此第二版中受訪者不僅具名出現，而且附上照片。



《埃崙詩集》初版（1980）



《埃崙詩集》二版（2014）

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我身為臺灣的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學者，不斷思索如何運用自身的文學利基，發揮文化特色，做出與眾不同的研究？1994 年至 1995 年，我擔任哈佛燕京學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人，在哈佛大學旁聽了不少課，遇到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包括研究莎士比亞的新歷史主

義（New Historicism）大家葛林布萊特（Stephen Greenblatt）。雖說旁聽者不必繳交期末報告，不過我針對自己深有感觸的《埃崙詩集》撰寫論文，交給不同課程的老師，請他們批評指教。由於原詩是中文，用上不少中國文學與歷史典故，因此在改寫成中文時更是如魚得水，盡情發揮，結果就是〈「憶我埃崙如蜷伏」——天使島悲歌的銘刻與再現〉，請同事李有成在中研院歐美所的「再現：第二屆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代為宣讀。研討會論文送審時，有位審查人建議我到現場勘查。於是我在美國東岸哈佛大學一年訪學結束後，特地繞道西岸舊金山，在唐人街待了整整一星期，拜訪幾位華裔美國文學與歷史的前輩學者（包括麥禮謙），當面請教，進一步蒐集資料，也專程搭渡輪登上天使島，參訪昔日華人移民拘留之地。我便根據這些經驗與資料修訂論文。

由於《埃崙詩集》的詩文以英漢對照方式呈現，而且涉及華人移民史，因此我運用上自己在華裔／亞裔美國文學，以及美國華人史、美國移民史、翻譯研究、比較文學等不同領域的研究經驗。這篇兼具文學與歷史的論文一改再改，最後的中文定本超過三萬字，是我個人數一數二的長文，也是寫來最帶感情的學術論文。總之，撰寫與修訂這篇論文的漫長過程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探尋與解惑，結合了理性與感性，至於因而首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則是意外的收穫。

在研究過程中還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像是編者之一的 Him Mark Lai，要不是他自己告知，沒有人會知道他的中文姓名是「麥禮謙」。我是從與他的訪談中得知，他父親 Bing（原名「麥沃炳」，又名「麥炳」）於 1910 年以「假兒子」（“paper son”）的方式，冒充黎廣泮（Lai Poon）之子前往美國，成為留置在天使島移民拘留所第一艘船上的乘客。他父親為了讓子女永誌

不忘自己真正的中國姓氏，於是把原來姓氏「麥」（Mak, Mark）化為姓名的一部分，而 Lai 則是當年冒充的姓氏「黎」。因此，光是一個名字裡就隱藏著許多幽微的歷史。

有趣的是，你的研究可能會回過頭來影響到研究對象。我在哈佛大學撰寫那篇論文時，曾寫信向麥禮謙請教三位編者如何分工，以及書中為何把詩分成兩部分。他回信仔細說明了三人合作的情形，並且透露第一部分的詩寫得比較好，第二部分的詩則不然，但考量到這些都是辛苦蒐集到的珍貴一手資料，如果不納入書中，很可能從此就不見天日，於是分為兩部分，為了節省篇幅和成本，把第二部分的字體縮小。他幾度跟我提到，該書出版後又蒐集了一些資料，將來增訂出版時會把兩部分合而為一。後來我訪談譚碧芳時，她說自己去探望重病的麥禮謙，詢問增訂該書的計畫，他在病床上還慎重交代此事，因此 2014 年增訂本就將初版的兩部分詩作合而為一。至於我這篇論文的英文版以及相關詩作的解讀，也獲收入美國大學出版社的論文集裡，經常用作大學相關課程的教材，就我所知，美東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與美西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史書美教授都採用過。

照說在美國研究華裔／亞裔美國文學的學者不在少數，而華文世界研究漢詩的學者更不可勝數，然而我卻因為臺灣學者的雙語言、雙文化背景，得以深入研究這個華裔／亞裔美國文學與歷史的重要文本，並且結合訪談，對於相關研究有些許獨特的貢獻，中英文論文都被納入《埃崙詩集》二版的參考書目。

伍、訪者之談

除了翻譯與論述之外，訪談是我學術生涯中另一個重要的

面向，也是一般外文學者鮮少從事的領域。我與訪談這個文類結緣甚早，在臺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閱讀《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作家訪談錄，覺得比論文有趣得多，因為一方面可以得到來自受訪者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不時會讀到一些文壇軼事，得悉作家罕為人知的一面。我讀了之後非常喜歡，想與人分享，於是選譯一些著名英美作家的訪談錄，集結成冊，出版社也很看重此書，審慎處理，直到我博士畢業那年才出版《英美名作家訪談錄》（書林，1986），成為我出版的第三本譯作。

雖然說翻譯是最細的閱讀與最好的學習，但是訪談涉及實作，只翻譯訪談畢竟還是紙上談兵，然而若要實作也必須找到適當且願意配合的對象，才可能達到《巴黎評論》那樣的水準與價值。因此，有幾年我雖然心嚮往之，卻苦無機會。1983年終於機緣成熟了。該年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淡江大學舉行四年一度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第四屆），博士班老師張漢良教授擔任議事組主任，鼓勵我發表論文。多方考慮後，我決定以王文興老師的作品為對象，在國際會議上發表有關臺灣文學的論文，並想藉此機緣跟王老師進行訪談。當時我心裡十分明白，如果能從王老師口中獲得一些前所未有的訊息，這篇訪談將成為王文興研究的重要資料，價值遠在我的論文之上。我請示王老師願不願意接受訪談，他欣然同意，並且表示自己也很喜歡閱讀《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錄。

於是我重新細讀王老師的所有作品（幸好他的作品質精量少），以及重要的二手資料，整理出兩百多個大大小小的問題，一個問題抄在一張卡片上（只用單面），分門別類。訪談是在他的研究室進行，我當面詢問，王老師逐一回答，毫不迴避。

第一次相談甚歡，但仍有許多問題來不及詢問，於是相約第二次到王老師家裡訪談，王老師還出示了一些難得一見的資料，包括作為大綱的卡片，以及寫作過程中錘鍊文字的紙張與紙條上的痕跡。兩次訪談謄稿經王老師修訂，整合後再次請他確認，全長三萬多字，是有關小說家王文興最詳細的訪談之一。這一切都是仿照《巴黎評論》的作業模式。

因此，我個人進行訪談的初衷就是好奇與代言：對於作家與作品好奇；藉由訪談代讀者向作家提問，並讓受訪者透過這些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與心聲。至於在態度上則是尊重個人，藉由建立互信，彼此合作，共同探求史實，發表見解，留下紀錄。因此，最重要的是事先做足功課，再臨場應變，順藤摸瓜。方法上可以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但遇到比較敏感的問題，也可以旁敲側擊，目標在於探求史實，留下見證與第一手史料。



單德興與王文興老師於台灣大學總圖書館旁進行「宗教與文學」訪談。（2010年4月25日，林靖傑提供）

我從 1983 年首度與王文興老師訪談，深深感受到訪談這個文類獨特的吸引力。儘管每次訪談從頭到尾要花很多的工夫與心力，而且未必能夠發表，但我樂此不疲，從 2001 年起陸續出版了五本訪談集，都是秉持著這種態度與作業模式。許多人看到我這些年來訪談了不少國內外作家、學者、專家，還以為我生性外向。其實我的個性有些內向，不會主動去攀緣。然而涉及相關作家、學者或議題時，為了深入研究，獲得文本以外的資訊，就會想要當面訪談或書面訪談。這股期盼的力量會驅策自己去超越原先的界限，奮力達成目標。

訪談必須雙方協力才可能完成，不像寫作般可以自己充分掌握，因此更需要意志和機緣，實例就是我與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訪談。他不僅是後殖民論述的重要奠基人，也是國際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因為長年為巴勒斯坦族人發聲，曾遭到死亡威脅，後來又罹患惡疾，我曾多次寫信與他聯絡，都石沉大海。1997 年我在完成他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譯稿後，親赴紐約，幾經波折，終於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室裡與他見面。結果他不但回答了我從臺灣帶去的所有問題，而且表示我的問題促使他去思考一些從未想過的議題。也因為第一次訪談非常成功，雙方相談甚歡，所以第二次、第三次訪談就都水到渠成，以致有不少人視我為「薩依德在中文世界的訪談者」。

多年來我訪談的對象不下數十位，各有各的個性、背景、專長、興趣與關切，互動的方式也隨之不同，然而基本的原則與方法則是一樣的。我的心態就是把握難得的一期一會，隨緣盡分，根據標準作業程序，在可能範圍內做好一切準備，事前充分籌劃與溝通，提供訪綱，現場隨機應變，事後將訪談稿送請受訪者過目（除非受訪者明確表示不看稿），因此訪談稿是

雙方協力的成果（collaboration）。以往我訪談只是錄音，晚近則不但錄音，而且錄影，希望留下受訪者的生動身影與影像紀錄。我從與受訪者的密切互動中，學到許多從文字資料得不到的寶貴經驗，藉由讀書、訪談，而達到知人、曉事、論世的效果，使得我的學術生涯因為與專家智者的深入對話而更生動活潑，增長專業知識、人生經驗與生命智慧。

國內做口述史的人不少，也有不同類型的訪談，然而像《巴黎評論》這類的訪談比較少，外文領域的訪談更少。個人因緣和合，從1983年以來訪談了數十位國內外作家、批評家、理論家，自覺受益良多，因此不僅將有機會完成的訪談在期刊雜誌上發表，結集出書（手邊還有不少訪談因故未能完成或發表），還應中山大學外文系張錦忠教授之邀，根據多年經驗與心得，撰寫《訪談的技藝》，希望吸引更多人來從事這個勞力密集卻生動有趣的工作，共同以文字與影像留下重要史料。

陸、作者之途

我有自知之明，曉得自己缺乏豐富的想像力，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虛構或編造，這也許是摩羯座務實的個性使然。因此，在四大文類中，我沒有嘗試往小說、戲劇、詩歌發展，而是集中於散文，初衷則在於自我探索，抒情言志，敘事紀實。我曾在不同場合發表一些非學術性的文章，最重大的促因是2001年法鼓文化《人生》雜誌邀我為「浮世隨筆」專欄撰稿，也在「書香人生」、「清心自在」、「人生書摘」等專欄發表文章。《人生》雜誌是臺灣歷史悠久的佛教人文雜誌，我的身分是外文學者與佛教居士。學者做學問講究客觀，論述盡量不

涉及一己情感，而身為作者，文章著重個人特色與主觀感受，卻又要避免陷入自艾自戀、感情用事（sentimentalism），因此必須留意主觀與客觀、抒情與濫情之間的分際，在學者、作者、佛教徒三種身分之間尋求最大的交集。

總之，我抱持的態度就是坦誠以對，直抒胸臆，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透過平實通順的文字表達出來。其實，寫文章並不是事到臨頭，坐在電腦前猛敲鍵盤就能完成，而是要厚積薄發，在日常觀察與平時閱讀中，隨時隨處留意自己的感受與體會。寫作時針對特定主題，蒐集相關資料，把平日片片段段的觀察、閱讀、感受、體會串連起來，成為一篇具有起承轉合的文章。

寫作與翻譯一樣，需要不斷的修改，力求精進，因此我一向奉行「寫作就是重寫」（Writing is rewriting.）。寫任何文章，包括學術論文，我不但自己一改再改，也委請朋友與助理過目，歡迎提供意見，供我綜合考量，推敲斟酌，務期使自己的寫作更臻完善。交稿後，在雜誌編排的過程中，通常有三次校對的機會，可參酌編輯的意見，進一步修訂。在出書的過程中也有三次校對與修訂的機會。不管是刊登於期刊雜誌或出書，我都是仔細校對，隨時修訂，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因此我很感激編輯們容忍我對文字的龜毛態度。

我不是才華橫溢型的作者，寫文章無法一揮而就，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累積，在電腦前一字一句慢慢敲出初稿，再靠著一次又一次的重寫與修訂，在益友畏友的督促與協助下，讓文章一步步精進。整個過程雖然辛苦，費心耗時，但看到心中原先模糊、片段的想法，透過文字逐步成形，漸趨完整，會有一種苦盡甘來的喜悅。多年下來積少成多，至今出版了四本文集，縱然是學術外的副產品，卻是我投注許多感情與心力的成

果，為自己的人生旅程留下雪泥鴻爪，因此是我相當偏愛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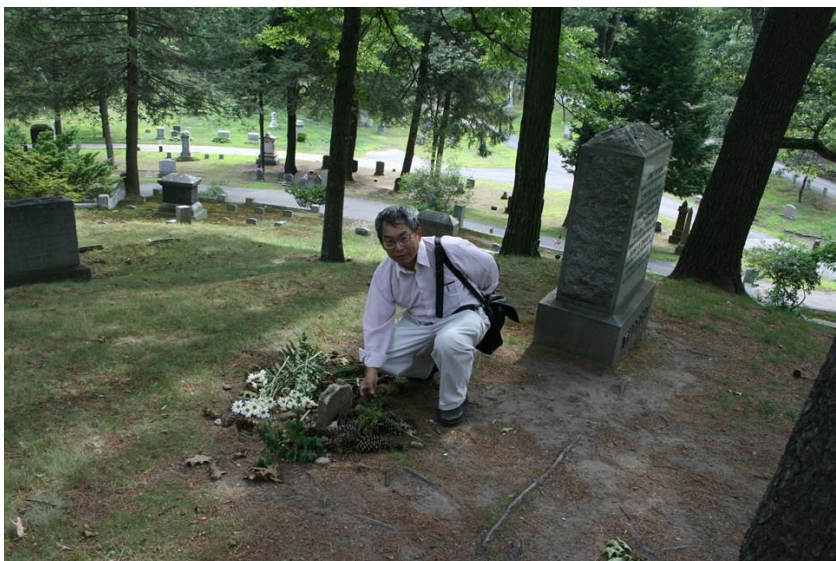
以我寫梭羅的文章為例。我大一就讀過《湖濱散記》的中譯本，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譯者「吳明實」（「無名氏」諧音）其實是假名，真正譯者是徐遲，但因為 1949 年後留在大陸，以致未能以真名示人。大四修美國文學史時，在老師指導下讀 *Walden* 原文，得以從美國文學的脈絡進一步瞭解這部作品。1994 年桂冠圖書公司的「世界文學名著」系列出版孟祥森翻譯的《湖濱散記》，我應邀撰寫五千字左右的〈梭羅導讀〉，在閱讀資料與撰文的過程中，對此書有了更深的體會。因此，多年來我對這本書和作者梭羅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湖濱散記》一書使得華爾騰湖（*Walden*）成為觀光勝地，甚至成為梭羅粉絲朝聖之地。1992 年好友張力驅車帶我前往參訪，步行繞湖一周，買了一些紀念品，以示到此一遊。1994 到 1995 年我在哈佛大學研修，也曾開車帶友人前往參訪。2007 年為梭羅誕生一百九十週年，我前往參加梭羅學會年會（*Annual Gathering of the Thoreau Society*），並在當地的殖民客棧（*Colonial Inn*）住了四天，那是他和姑姑曾經同住過的地方。2017 年適逢梭羅兩百歲誕辰，我再度趁在哈佛大學短期研究期間，走訪他的故鄉康考德（*Concord*），第二次參加年會，同樣下榻於殖民客棧，這次待了六天。

參加年會特殊之處，就是除了在會場宣讀論文與交流之外，主辦單位還安排了許多參訪活動，尤其是由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帶領參訪觀光客不會去的一些景點、甚至秘境，並現場解說當年的情境與軼事。比方我們來到了一片草坪，那裡原是一座監獄的舊址，梭羅因為反對美國入侵墨西哥，拒繳人頭稅，在監獄裡待了一晚，據說是他姑姑代付後才獲釋。又如梭羅的

出生地，原先那座兩層樓的農舍非常破落，我於 2007 年初訪，上樓時木頭樓梯嘎吱作響，十年後再去參觀，不僅整修完成，而且不時舉辦展覽。梭羅家以製造鉛筆聞名，但昔日的鉛筆工廠如今在一片森林中，只剩下斷垣殘壁，讓人驚識世事的無常與大自然的力量。兩次年會我都前往他長眠的睡谷墓園（Sleepy Hollow Cemetery），赫然發現文學史上如雷貫耳的梭羅，墓碑竟然異常矮小，上面只刻了“Henry”一個字，自然樸實得一如他的生前，墓碑上有人擺上幾顆小石頭向他致意，周圍也有人獻花。

中文世界雖有一些介紹梭羅的文章，但多為「到此一遊」式的報導，為了深入引介梭羅其人其作，我在《人生》雜誌的專欄中，把閱讀、翻譯、研究的多方資料，配合前後兩次十天的現場蹲點、實地踏查的經驗與體會，寫成一系列七篇文章，



梭羅位於睡谷墓園的墓碑

總共兩萬多字，後來合併為一篇，取名〈特立獨行的新英格蘭之子——尋訪梭羅的足跡〉，收入《禪思·文思》（法鼓文化，2017），這是中文世界罕見的梭羅深入報導。總歸來說，不論是寫一般文章和學術論文，我都遵循既定的作業模式，事先所做的認真研究，撰寫時的敬謹態度，毫無二致。如此盡心盡力寫來，對讀者負責，身為作者的我也才能安心。

柒、編者之徑

如果說以上各項主要是為了呈現與分享自己的想法、興趣與專長，那麼編輯的初衷就是針對特定的領域或單一的主題，提供專業服務。我編輯的中文書有六本（兩本合編），英文專書有三本，另有兩本（四冊）編譯的書則由我組織二十人左右的翻譯團隊協力完成。

以我主編的會議論文集為例，都來自中研院歐美所主辦的會議，由我擔任秘書長，負責會議的籌辦、召開，到會後的論文審查、編輯、校對、出版。中研院歐美所的專書論文採用期刊論文的作業模式，嚴謹審查，精挑細選。為了將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做最佳的呈現，不僅有嚴格的學術審查作業，後續的編輯、排版、校對、索引等也竭盡所能。整個作業過程中，由主編負責穿梭聯繫，除了作者（有時包括譯者）之外，還有與排版者、校對者之間的互動。根據臺灣出版界的慣例，出版一本書要經過三校，但每回我都至少與兩位助理同步校對，也就是說，一般的一校在我這邊至少是三人次的校對，加上三校後的校樣與藍圖，往往超過十人次，這還不含出版社內部的校對。雖然有人說校對就像掃落葉，再怎麼掃都掃不乾淨，但我認為，

至少每撿一片落葉，就少了一片。學術論文都是學者的心血結晶，必須像面對自己的作品一樣，盡力善待，做最好的呈現，以免功虧一簣。

編輯英文專書的因緣則更特殊。當時有機會透過中研院歐美所或國科會邀請到美國與歐洲的院士，如文學批評家柯理格（Murray Krieger）、米樂（J. Hillis Miller）、伊哲（Wolfgang Iser）、哲學家羅逖（Richard Rorty）來臺灣發表系列演講。個人覺得花了那麼多的工夫與資源，請到這些國際級的大師，如果僅止於口頭演講，而沒有留下具體的文字紀錄，未免可惜。因此，在這些院士到訪之前，就先安排在報章雜誌或《中外文學》發表相關作品或譯作（甚至為《中外文學》客串主編米樂與羅逖的專號），作為暖身。基於資源共享的原則，系列演講安排在南北部不同學術單位舉行。活動結束後，英文講稿刊登於歐美所出版的《歐美研究》季刊，有些並由自己翻譯或與人合譯成中文。我也與來訪學者進行訪談，將內容譯為中文，分別收入中英文專書。我翻譯柯理格的《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書林，1995）以及與陳東榮、何文敬、林素英合譯米樂的《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書林，1995），獲選 1996 年行政院新聞局優良中譯圖書。雖然這些工作耗時費力，而且在學術評量時不計入研究績效，但我認為必須把握難得的一期一會，進行交流，並為中文世界留下一些具體的學術成果。

談到編譯的實例，這裡以我「金盆洗手」的《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允晨文化，2020）為例。作者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教授出生於香港，為當年全香港前三名的高材生，中英文造詣俱佳。她多年任教於加州大學柏

克萊校區族裔研究學系（The 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是著名的亞美／華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專家，當今許多美國中壯輩學者都出自她的門下。由於她多年在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與教學方面的卓越貢獻，2014 年榮獲亞美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頒發終身成就獎（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我是在 1995 年的舊金山之行與她結識，此後一直保持聯繫，2005 至 2006 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研究訪問時，曾旁聽了她一學期的課。有鑑於她的傑出研究成果與深遠影響，我多方蒐集資料，與她進行深度訪談，2007 年發表於《中外文學》。2014 年我再度前往該校研修，因為她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英文發表（也有幾篇以中文發表），於是與她商議是否依照我編譯《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亞美學刊》四十年精選集》上下冊（與梁志英〔Russell Leong〕、唐·中西〔Don Nakanishi〕合編，允晨文化，2012, 2013）的方式，由我組織翻譯團隊，譯成中文，與中文讀者分享她數十年的學術成果，黃教授欣然同意。於是我邀請相關學者與譯者組成翻譯團隊。令人感動的是，應邀者體認到這項計畫的意義，都立即答應共襄盛舉，義務翻譯。這種編譯計畫既是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也是翻譯轉向（translational turn），藉由跨語文實踐，讓資深學者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得以跨越國家與語文的界線，傳播到異語、異文化的脈絡，以期落地生根，綻放出繁花異果。

為了達到以上目標，我堅持三項原則：學術專業，優良譯者，完整呈現。自 1990 年代起，臺灣學界在相關領域已經耕耘了二十多年，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外文學者，其中多人有豐富的翻譯經驗。再者，臺灣言論自由，無須顧慮思想審查的問題，原文可以完整再現，譯者也可以視需要增加譯註以協助讀者理

解。放眼全世界，當今也只有臺灣能擔負起這樣的英中學術翻譯任務，藉由有心於學術傳播者積極參與，群策群力，讓一位代表性的華裔學者多年研究成果，得以在華語語系廣為傳播，從另類觀點與跨國角度，深入瞭解其中的族裔再現、華美視野、學術議題、研究方法、論述策略與倫理關懷等等。

這個翻譯計畫工程浩大，前後花了六年，所幸在諸多條件配合下，圓滿達成目標。承蒙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熱心協助，於高雄與臺北舉辦新書發表會，邀請多位參與的譯者分享經驗，作者黃教授特地錄製影片發表感想。我彙整兩場新書發佈座談內容，請每位發言者確認後，全文刊登於《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電子報》2021年夏季號，既為此大型編譯計畫留下紀錄，也與未能參加盛會的人分享。

從事如此巨大的編譯計畫耗費甚多心力與時間，讓我六年來牽腸掛肚，最後的校對與索引編排更是繁瑣耗神，我甚至校對到眼睛發痛，多少體會到什麼叫做「目眇脫窗」。總算在眾人協助下一一完成，達到學術交流、文化傳播與服務社群的初衷，完成我最後一個為人作嫁的編譯計畫。

捌、行者之道

這裡所謂的「行者」既是人生道路上的旅行者，也是菩薩道上的修行者，在這些不同角色中，很可能是最不容易談的，但也是最貼近個人的，因為涉及生命課題與終極關懷。修行的初衷是為了瞭解生命的意義，重要的是知行合一，理論與實踐配合，不要只是研究佛理，而未能落實到日常生活中，使自己和他人受益，也就是佛教徒常說的「學佛」與「佛學」的區別。

有時會有人介紹我是「佛教學者」，但我都特別聲明自己不是「佛教學者」，而是「佛教徒」與「學者」，前者是我的宗教信仰，後者涉及我的專業——文學，而不是佛教。

在確定初衷與身分後，目標隨之明確，而修行過程就是朝向目標鍥而不捨。我在當兵期間花了絕大部分的時間閱讀佛書，確立自己的方向，選定道場，決定跟隨聖嚴師父修學，至今已超過三十年。在家居士有自己的家庭、社會與職場等多方面的責任，無法像法師般全力投入修行與弘法。既然因緣如此，我就抱持著「不怕慢，只怕站」的心理，只要堅持跟隨不離，即使不是很精進，但時日久了多少會有些長進，最怕的是完全擱下，失去薰習佛法的因緣。

師父曾說，學佛切忌成為「摸門教」，意思就是東摸摸西摸摸，什麼都沾一點，但都不深入。我個人選擇禪修作為學佛的起點，並學著將禪修的觀念與方法運用在生活中。師父後來提倡的默照禪，我覺得對現代人特別有用。當然佛法有許多不同的法門，可以選擇自己比較相應的，作為安心立命的方法，但也尊重其他人的選擇。有些人可能覺得念佛法門是老人家在修的。就我個人粗淺的領會，念佛是殊勝的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千萬不可小看。若能念到一心不亂，那種定力更是非比尋常。

修行如同讀書，如果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因此良師益友非常重要。以我個人的因緣來說，學佛方面的良師當然就是聖嚴師父，益友則包括大專教師學佛讀書會、法鼓文化以及其他場合的同參好友。這裡談談「和光同塵」的觀念。如同辜老師在開場白中所說的，有些學佛者嘴上常常掛著一大堆名相，看似很有學問，然而本身對這些名相是否真正瞭解？即使瞭解，又奉行了多少？口中時時都是這些名相，是使周遭的人更

親近佛法，還是令人覺得高深莫測，甚至敬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們身為知識分子或佛教居士，如何不因為知識或宗教以致自我感覺良好、高人一等，而能「和光同塵」，與人親切相處，打成一片，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在我看來是畢生的重要功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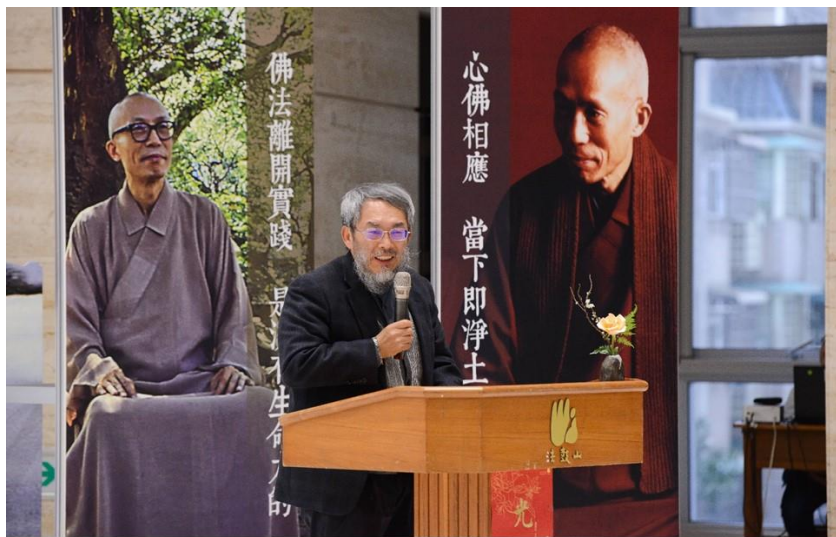
我雖然也看了一些佛書，但個人覺得比較親切受用的是平易近人而發人深省的法語，像是《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本身不帶濃厚的宗教色彩，卻蘊含了師父多年禪修的心得，隨時隨地都可應用，與佛教徒及非佛教徒結緣。我曾經與一位定居美國多年的大學同學分享「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位同學本身是基督徒，覺得「四它」真好，而且自己在生活中也經常用上。由此可見，師父的法語可以超越宗教藩籬，讓更多人受益。

今天在法鼓文理學院裡講學思歷程這個題目，特別想分享的一則自在語就是：「學問的領域重在研究，經驗的範疇則為實踐。」由於聖嚴師父是學問僧，更是宗教師、大修行人，這句話由他口中說出力道非比尋常，提醒我們學問與經驗不同，各有特色，尤其是不要以文字知識取代親身體驗。

至於如何進德修業，方便之道就是學習與智者為伍。這裡所說的智者指的未必是知識學問，而是任何方面學有專精之人。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學者時時處處都是學習的機會。我們固然可以藉由讀書而知人、曉事、論世，也可以在生活中多觀察、多判斷，尋找各方面的楷模，擇其善者而學之，甚至負面人物和負面教材也可當作警惕。如此趨善避惡，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日積月累，就能內化為生命的一部分。其實我們周遭就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對象，端看我們如何觀察與實踐。這也正如聖嚴師父所強調的，「佛法離開

實踐是沒有生命力的」，必須落實在生活與生命中，藉由身體力行來自我提升，進而擴大影響，邁向建設人間淨土的理想。

我自己是文學學者，這方面的楷模除了先前提到的一些老師之外，還有幸結緣《巨流河》的作者齊邦媛教授。她多年致力於文學教育，曾說：「文學給了我一生的力量」，「文學的責任是看真正的人生，文學的目的是使世界變得更好。」的確，我多年鑽研文學，得以瞭解更多的人生，認識更多的人性，相信文學能擴大視野與胸襟，拓展創意與想像力，培養同理心與悲憫情懷，發揮淑世的功能。另一方面，身為佛教徒，我受益於佛法的地方很多，認為文學與佛法有很多相通之處，尤其「人間佛教」的理念更符合當世的需求，因此稍微轉化齊教授的說法如下：



2016年3月《聖嚴法師年譜》於臺中寶雲寺新書會

佛法給了我一生的力量。

佛法的責任是看透真正的人生，佛法的目的是使世界變得更好。

玖、六者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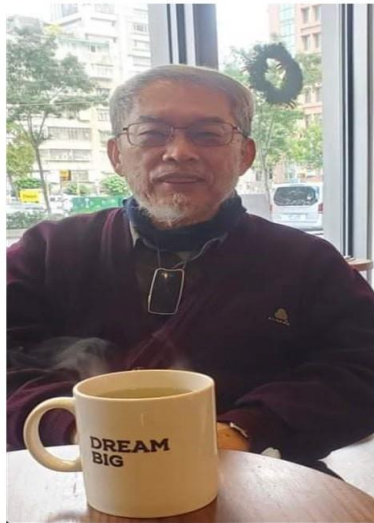
回顧這一生與學思歷程，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藉由文學研究結合興趣、專業、職業、志業，也在佛法中找到自己的終極關懷與安頓身心之道。因為個人在文學與佛法上受惠良多，所以一直試著要滙通文學與佛法、學院與社會，希望透過語言文字將個人的所見、所學、所思、所感分享給有緣人，期盼發揮「文普」與「禪普」的作用。

以上所提到的譯者、學者、訪者、作者、編者、行者六個不同身分，各有初衷、態度、方法，彼此之間有相通相輔之處。在我個人的學思歷程中，「譯者」藉由文字的轉換，讓閱讀變得更容易，不僅原作者受益，讀者也受益，其實受益最大的是譯者本人。「學者」除了是學有專長的人，更期許自己是終身學習者。「訪者」既是探訪者，也是受訪者與讀者雙方的代言人。「作者」是自我定位的文字勞動者，效法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勤勉筆耕。「編者」既是編導者，藉由編輯來引導，也是分享者。而從「行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既是人生之路的旅行者，也是靈修之道的踐行者。綜上所述，可以底下的表格呈現：

身分	工作	角色	初衷	態度	方法
譯者	翻譯	易者 益者	分享	敬重文字	耐煩 細心
學者	研究	學術專業人 終身學習者	探尋 解惑	步步踏實， 句句有據。 瞭解既有學 術，力求突 破創新。	善用利基 發揮長項 展現特色 時時反思
訪者	訪談	探訪者 代言者	好奇 代言	尊重個人 探求史實	開門見山 旁敲側擊 建立互信
作者	寫作	文字工作者	探索 敘事 抒情 言志	直書胸臆 真誠平實	厚積薄發 一改再改
編者	編輯	編導者 分享者	專業 服務 敬業 樂群	精挑細選 最佳呈現	耐心溝通 悉心處理
行者	修行	旅行者 踐行者	生命 意義 知行 合一	認定目標 鍥而不捨	禪淨雙修 融入生活

這個月初（2021年12月）我與好友李有成教授見面聊天，他幫我拍了一張照片。照片的前方有只杯子，上面印著 DREAM

BIG 兩個字，這要如何翻譯、詮釋或引申呢？一個是「大做夢」，不切實際，癡心妄想猛做春秋大夢，卻馬齒徒增，未能成事。另一個是「做大夢」，有弘大的夢想、願望，並想方設法，透過具體步驟逐漸壯大、實現，也就是我開頭提到的「有夢最美」、「築夢踏實」。人身難得，生命可貴，如何區別妄想與理想，善用此生逐步落實，在因緣和合下，達到利人利己的目標，卻又不執著於此，無住生心。正如我很喜歡的聖嚴師父這句自在語：「生命的意義在不斷的學習與奉獻之中，成就了他人，也成長了自己。」期許自己能像法鼓山的來迎觀音，以所知、所學來迎接、接引更多人，進入文學、文化與佛法的世界。



有夢最美，築夢踏實（2021年12月5日，
李有成攝）

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一期一會的機緣，以感恩與報恩的心，向我受惠良多的老師們致敬，並與諸位分享我的學思歷程，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參考書目（References）

翻譯

- 單德興（1997）。《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Edward W. Said 原作。經典版，臺北：麥田，2011年10月。318頁。（《中國時報》1997開卷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1997最佳書獎／文學類）
- 單德興（2003）。《禪的智慧：與聖嚴法師心靈對話》（*Zen Wisdom: Conversations on Buddhism*）。聖嚴法師原作。臺北：法鼓文化。350頁；大字版，臺北：法鼓文化，2020年9月。372頁。
- 單德興（2004）。《格理弗遊記》學術譯注版（*Gulliver's Travels*）。Jonathan Swift 原作。臺北：聯經。672頁。（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成果）

論著

- 單德興（2011）。《薩依德在臺灣》。臺北：允晨文化。511頁。
- 單德興（2016）。《翻譯與評介》。臺北：書林。264頁。
- 單德興（2019）。《翻譯家余光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351頁。
- 單德興（2019）。《跨界思維與在地實踐：亞美文學研究的多重視角》。臺北：書林。352頁。
- 單德興（2020）。《訪談的技藝》。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120頁。

訪談集

- 單德興（2014）。《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臺北：允晨文化。446 頁。
- 單德興（2020）。《擺渡人語：當代十一家訪談錄》。臺北：書林。454 頁。

文集

- 單德興（2007）。《邊緣與中心》。臺北：立緒文化。304 頁。
- 單德興（2017）。《禪思·文思》。臺北：法鼓文化。480 頁。
- 單德興（2021）。《法緣·書緣》。臺北：法鼓文化。264 頁。

專書編輯

- 單德興（2016）。《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8 齊邦媛》。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378 頁。
- 單德興（2018）。《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臺北：書林。448 頁。
- 單德興（2020）。《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上下冊）（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著）。臺北：允晨文化。992 頁。